

马克思的流通经济理论及其中国化启示^{*}

谢莉娟 王晓东

内容提要：马克思的流通经济理论在新时代仍有重大价值，科学认识市场流通一般规律和中国流通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定性，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大局。本文梳理了马克思流通经济理论的要点，并结合中国经验归纳了社会主义流通特殊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流通过程体现着资本的本性并生产着资本的生产条件，从而加剧过剩性危机和贫富两极分化。中国社会经济制度基本属性则决定了，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化大流通除资本流通形式外，还应保留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或交换目的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一定比例的高质量发展，并在整个社会商品流通过程中实现简单商品流通“目的”和资本流通“手段”的有机结合；同时，流通特殊还体现为，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以政府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重要商品储备和流通调控、现代流通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定位、支持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商业资本结构合理化。本文也为深化流通改革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流通经济理论 流通特殊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引言

马克思流通经济理论的中国化发展及实践，是个既老又新的“中国问题”。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有无商品流通、如何认识商品流通（尤其是资本流通形式）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应有之义，曾引发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的重大争鸣。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构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较早破除了“无流通论”。在中国发展市场经济的实践中，流通体制改革始终是建立和完善市场体系的重要内容。流通作为上联生产、下联消费的关键环节，成为维系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动态平衡的核心枢纽。在中国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人们能居家购物保持生活安定，流通领域的职能担当功不可没，流通业的复业、复市对上游生产的复工、复产发挥了关键作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更突显了流通在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加快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中的战略意义。

2020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把建设现代流通体系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来抓。”会议指出，“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国内循环和国际循环都离不开高效的现代流通体系”；强调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流通体系建设取得明显进展，同时也指出其“存在不少堵点亟待打通”。^①诚然，面向新时代加快完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中国流通领域还有若干问题亟待回答，更要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研究。

在上述背景下，本文的核心问题有二：一是结合《资本论》及其出版后重新整理的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对马克思流通经济理论的要点予以系统地再梳理。这一必要性缘于21世纪以来，该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研究中一度鲜有探讨。最近二十年内，基于西方经济学范式的市场（market）、贸易

^{*} 谢莉娟，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xielijuan@ruc.edu.cn；王晓东（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市场流通经济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00872，电子信箱：wangxiaodong@rmba.ruc.edu.cn。本研究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品交易形式选择与商业资本的形成机制研究”（17BJY226）资助。作者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①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支撑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出席》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0-09/09/c_1126473726.htm。

(trade)、交换(exchange)、渠道(channel)、销售(sale)等与流通相近或相关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流通研究中,人们淡化乃至混淆了流通的概念,甚至不了解流通理论的源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①重新研究这一经典理论,在当前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就很有必要了。二是结合市场经济中“流通一般”的共性规律,通过对比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特性,归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流通特殊”。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不能采用教条主义的态度,也不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②“我们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③

二、马克思流通经济理论的中国化探索回顾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与商品交换是否具有相容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里没有现成的答案,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原苏联模式又容易形成社会主义对应计划经济的认识,从而否定商品流通。如斯大林说过“商品流通是和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前途不相容的。”^④虽然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人较早意识到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重要性,^⑤但囿于计划经济特定阶段的现实和认识上的反复,使得我们在改革中对商品交换的认识仍经历了曲折的探索,也在后来使流通理论发展面临客观上的观念障碍。

中国经济学界对该问题的关注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大讨论。《经济研究》在1959年专门刊登《北京部分经济理论工作者座谈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与价值规律的讨论情况》予以总结“这个讨论在1956—1957年间进行得十分热烈;在这个期间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和若干专著。”其存疑之处主要在于“交换关系的性质及其发展趋势问题”,最典型问题如: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经济往来是否商品交换?国营商店卖给全民所有制企业职工的消费品是否商品?再如:价值规律能否调节社会主义的生产和流通?对此,孙冶方(1956)指出“我们要把这个盲目自发的规律变成成为我们自觉掌握的规律,……通过计算去寻找它、发现它、尊重它,并进一步而掌握它,使它为我们服务。”顾准(1957)更直接地提出“价值规律既调节生产,也调节流通。既调节消费资料的生产与流通,也调节生产资料的生产及其转移过程。”孙冶方(1959)随后又指出,社会主义的交换体现着等价交换基础上的商品交换的本质,驳斥了消费品不是商品的说法,并指出尊重商品交换和等价交换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这在当时颇有争议。^⑥事实上,当时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任何概念的突破都要付出更谨慎的求证,在涉及流通过程时更是如此。例如,于光远(1959)反对骆耕漠(1957)把“商品”定义为“私有的和经过买卖以供社会消费的产品”,指出“商品一般应该把私有制下的同公有制下的商品都包括在内”,由此才能概括社会主义制度下各种交换关系;他也反对孙冶方以“所有权有没有转移”来判断是否商品交换关系,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三

① 以贸易经济专业为例,学生们一定熟知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却可能说不上流通过程中“商品的惊险的跳跃”。

②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纲要》,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36页。

③ 习近平,202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第16期。

④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4页。

⑤ 毛泽东在20世纪50—60年代强调“新经济政策补课”、“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价值规律是“伟大的学校”,刘少奇在总结“共产风”“瞎指挥”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重视对流通过程的研究”。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936页;《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孙冶方(1981)。

⑥ 孙冶方曾回忆了他在20世纪60年代一次政治经济学辩论中引来的“责问”。参见《庆祝70年·名篇回顾|孙冶方“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第一条”》,https://www.sohu.com/a/320394813_796232。

类交换关系”都是商品交换。^①

在价值论基础上,孙冶方率先提出要重视流通过程的研究。他批判了现实存在的“无流通论”,认为用调拨、配给代替交换的做法严重阻碍着经济。他提出“流通一般”的概念,指出有社会化大分工就有流通过程,并将商品流通和产品流通看作社会主义流通的“两种特殊形态”(孙冶方,1981),这很大程度上在于为公有制内部的流通找寻理论依据。应该说,孙冶方的认识虽有局限性,但却是开创性的,不仅较早揭示出了“无流通论”是自然经济观点,^②他的大声疾呼也起到了实际效果。《经济研究》编辑部在1962年邀请北京部分经济工作和经济理论工作者座谈“如何进一步开展社会主义制度下流通问题的研究”时,流通重要性得到了普遍承认,与会者也指出“如何组织商品流通”的研究尚不能满足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需要。事实上,孙冶方在组织编写《社会主义经济论》时,主要疑难就在“流通过程篇”,也是他始终认为最薄弱的部分(高涤陈,1984a)。其实,这与计划经济背景有很大关系。孙冶方(1981)强调,“我们必须把流通同商品脱钩,离开商品来找寻交换和流通的必要性”,又及,“所谓计划性和自发性的差别,主要就表现在流通过程中,而不表现在直接生产过程中”。可见其仍囿于“产品的流通计划”,而脱离了商品又陷入了逻辑上的矛盾。这个“疑难”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中得到了回答。而孙冶方强调把资本主义带有破坏性的“自发”流通过程变为社会主义的“自觉”流通过程,当前仍有深刻启示。

改革开放后,交换的地位大不相同,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再度升温。首先是各大学术会议中的流通大讨论。例如,《经济研究》和《经济学动态》均刊登了1980年全国商品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情况,与会者一致认为,摆正生产和流通的关系是调整国民经济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际问题,并具体讨论了统一市场、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商品供求、商业体制、商业现代化等。^③类似讨论还有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生产资料流通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流通经济学等。^④其次是对孙冶方流通理论的再研究。例如,1983和1984年,《经济研究》和《财贸经济》编辑部先后召开孙冶方流通理论讨论会,并探讨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下要继续研究的问题。类似研究还有高涤陈(1984a,1985)、郑宁(1983)、张卓元(1984)、刘国光(1984)等。再次是对社会主义流通过程的概念性探讨或理论概括。如高涤陈(1981)提出“流通生产力”概念,随后又阐释了流通经济过程的内容和作用(高涤陈,1984b);陈甬军(1985)指出社会主义“有计划的自由流通”是建立在客观规律基础上的自觉流通;宋则(1985)概括了“流通过程超复杂化趋势”。类似探讨还涉及流通中的关系(杨承训,1986)、范畴(赵效民,1986)、特点(黄国雄,1988)及概念比较(林文益等,1989)等。

在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还涉及商品流通渠道(纪宝成,1991)、商业劳动性质(高涤陈,1995)、流通费用补偿(刘向东,2002)等问题的再讨论。特别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对流通领域劳动性质的探讨还延伸到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定位问题。随着交换愈加重要,理论界纷纷为计划体制下被视为“末端”行业的商品流通业“正名”,但对于如何摆正流通的位置则说法不一。如丁俊发(1998,2006)在不同时期提出了流通“决定论”“调节论”“一体论”,代表性提法还有“先导论”(刘国光,1999)、“基础论”(黄国雄,2005)等。直到2012年,流通业是“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文件中,理论界目前也多采用这一提法。近期文献还阐释了其理论依据在于生产性流通过程与纯粹流通过程所反映的劳动性质的科学划分(王晓东和谢莉娟,2020)。

^① 三类交换关系指: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或不同集体所有制单位间的产品交换;国营企业之间的生产资料交换;职工用收入向社会主义商业机构购买消费品的交换。

^② 高涤陈(1984a)为此将流通论归纳为孙冶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四根支柱之一,并指出其他三根支柱(价值论、经济效果论和社会化大生产理论)都必须通过流通论的补充才能得到全面论证。

^③ 参见邢俊芳(1980)及《全国商品流通理论讨论会简介》(《经济学动态》1980年第5期)一文。

^④ 参见黄任清(1983)、秦毅(1984)、李茂生(1986)。

纵向来看,中国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研究经历了一个由“重理论”到“重实践”的变化。其中值得反思之处在于21世纪以来的流通理论研究已明显滞后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流通研究更是相对有限。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拓宽视野和方法的同时,对流通问题的认识相对不足。“流通经济”学科体系的理论内核摇摆不定,又限制了应用研究。中国主流学术期刊的流通领域论文比重较低,特别是马克思流通理论研究有待发展,是流通学界的公认事实。^①

在近期为数不多的马克思流通理论再探讨中,主要分两类思路:一类在对马克思流通理论进行反思基础上(夏春玉,1997),倡导借鉴西方经济学以改变理论基础的单一化,在比较综合基础上实现创新(徐从才,2006;晏维龙,2009;祝合良和李晓慧,2016),或者更具体地,从西方经济学说史(夏春玉和丁涛,2011)、市场营销学(吴小丁和张舒,2011)或非主流经济学(夏春玉和丁涛,2013)视角追溯流通理论渊源。一类则强调对马克思原著思想的再认识(何炼成,2003;任保平,2011;杨圣明,2014;王福成,2019),重申其重大启示(周丽群,2017;纪宝成和谢莉娟,2018;王晓东和谢莉娟,2020),更具体还涉及流通过程(鲁品越,2016;柳思维,2017)、商业资本(宋则,2018)等重点篇章的再研究,并明确提出,马克思流通理论才是中国特色流通经济学的基本内核(纪宝成等,2017)。

综合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流通经济理论存在着突出的瓶颈:最近二十年来,相比汗牛充栋的西方经济学的市场或交换研究,此类研究亟待发展。^②新时代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防止“过时论”认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些人认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过时了,《资本论》过时了。这个判断是武断的,也是错误的。”^③

三、马克思流通经济理论的核心思想

(一) 对流通概念的厘清和本文研究口径

流通是一个基本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但理论界对它的理解一直有分歧,因而有必要正本清源,再度梳理这一概念。在马克思对资本流通过程的分析中,流通囊括了三个层面的涵义。

第一层面是“社会总资本的流通”,即资本循环运动的总过程($G-W \cdots P \cdots W' \leftarrow G$),亦即从资本意义上考察的社会再生产的宏观形式。具体又划为四要素:(1)实际生产过程及其持续时间;(2)“产品转化为货币”这个过程的持续时间;(3)货币按相应比例转化为原料、劳动资料等“生产资本的各要素”;(4)一部分资本同活劳动能力相交换。在这一层面上,作为以上第(1)要素的“生产只是流通的要素”。^④

第二层面的流通涵盖以上第(2)和第(3)要素,即马克思提及的“大流通”概念,代表资本在生产以外的运动过程,即“资本从离开生产过程到它再回到生产过程这一整个时期”,^⑤这一层面的“流通本身是生产的一个要素”。^⑥大流通也是马克思所说的“真正流通过程”,^⑦包括购入生产资料,以及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阶段的“商品的惊险的跳跃”。^⑧

第三层面的流通对应以上第(4)要素,即马克思提及的“小流通”概念,代表资本家以工资形式

① 原因是多方面的。最大冲击是20世纪90年代教育部将贸易经济专业调整为目录外招生(2012年重新进入目录),造成师资流失,学科步入低谷。可参考荆林波和袁平红(2018)对流通领域发文的统计。

② 作者以《经济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为例,列举了顶级期刊发文情况,限于篇幅从略。

③ 习近平,2020《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求是》第16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68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17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89页。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27页。

购买劳动力的过程，是“资本与劳动能力”之间的交换，^①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条件。通过“小流通”分析，马克思旨在揭示资本对劳动的不平等交换。

马克思在不同层面上使用了流通一词，也是人们对其概念有不同注解的原因。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流通经济”作为一个专门研究领域，重点在第二层面的“大流通”范畴，也就是将流通视作与生产相对的经济过程。正是这一层面的流通过程汇集着复杂而敏感的商品交换关系，流通过程的全局反映着社会整体市场，即“市场是流通领域本身的总表现”。^②由此也说明，将流通经济过程理解为经济大循环是不正确的，这是将“真正流通过程”与“社会总资本流通”相混淆了，后者才是现今讨论的“大循环”概念，对应着社会再生产或宏观经济研究范畴；而上述“大流通”或“真正流通过程”是其中的“交换”中枢，也是本文界定的“流通经济”范畴。

关于这一口径另要说明两点。一是，以上仅考虑了“资本”流通形式，考虑到商品经济的共性，还要加入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下的商品交换关系。当自然分工条件下个别的、偶然的剩余产品交换（W—W）发展到以货币为中介的普遍、经常的商品交换时，就出现了简单商品流通（W—G—W）。它反映了从商品出发，最后又回到商品上来的循环运动。这时，交换者的经济关系虽已物化在交换价值中，但交换目的仍在于获取使用价值，“为买而卖——是达到流通以外的最终目的，占有使用价值，满足需要的手段”。^③就完整的概念框架而言，商品流通可以不包括资本流通，而在资本流通之外，还可以存在简单商品流通。如马克思指出“虽然简单商品流通决没有必要包括资本的流通，——因为它可以在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进行——，但如上所述，社会总资本的循环却包括那种不属于单个资本循环范围内的商品流通，即包括那些不形成资本的商品的流通。”^④二是不应忽视，相比资本主义社会以前“资本在历史上最古老的自由的存在方式”，商人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被卷入资本运动总过程（G—W…P…W—G）“执行一种特殊职能”，^⑤因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通过程包含着相当规模的由专业化商人所承担的商业资本流通（G—W—G）。

图1总结了不同概念层次和类型的关系。下文所指的流通主要是再生产大循环中的“大流通”，商业资本流通则包含其中；而在社会化大流通之外，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下的商品交换关系也要加以考虑。它们共同代表了“真正流通过程”即本文探讨的流通经济过程。^⑥

（二）流通的地位和作用

流通本身作为交换的一定要素，对社会再生产有着重要意义，但随着交换关系愈加重要，生产决定论和流通决定论的观点对立是出现过的，在不同历史阶段，既有过重生产、轻流通现象，也有过对商业劳动生产性质的再争辩。^⑦说明我们当前仍要明晰这一问题。其实，马克思认为生产是决定性要素的观点是明确的，但他并没有概括为生产决定论，而是强调生产在支配其他要素时，不同要素在一个有机整体内相互作用。他有过一段经典阐释：“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⑧恩格斯也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8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92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2、364页。

⑥ 另外，无论何种流通形式下，“货币流通的前提是商品流通”，“货币流通只是居于第二位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97、580页）。研究商品流通不能不关心流通领域的资金运动，但专门研究货币流通或货币流回规律，则应归属现代金融或再生产研究范畴。

⑦ 限于篇幅从略，可参考王晓东和谢莉娟（2020）。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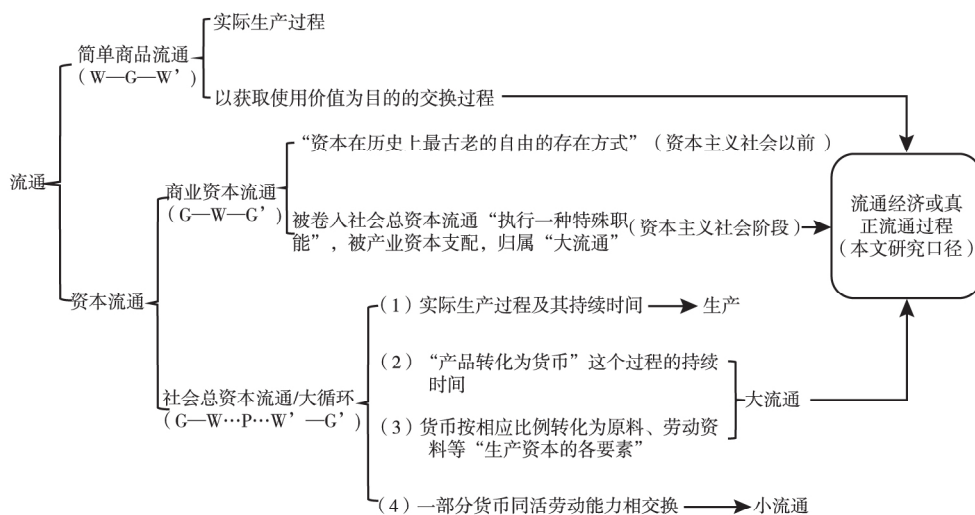


图1 流通的多层次概念和本文研究口径

过“生产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① 其中的道理不难理解,也没有过时。脱离了价值的生产,流通乃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供求失衡虽表现在流通领域,但源头还在供给侧。在对待过剩性危机这一资本主义经济头号难题时,相比需求学派与供给学派将其归因于流通、分配或消费的“流量”问题,马克思的深刻性正在于抓住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的生产过程”这一过剩的根源(鲁品越 2020)。

在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基础上,流通不仅仅发挥反作用,在社会再生产中,流通和生产同等重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篇政治经济学开篇就指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生产和交换是两种不同的职能。……这两种职能在每一瞬间都互相制约,并且互相影响,以致它们可以叫作经济曲线的横坐标和纵坐标”。^②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序言中也说“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③ 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将交换关系提到了重要位置上。在具体分析流通过程时,马克思说“生产过程如果不能转入流通过程,就要陷入绝境”;^④ 又说“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⑤ 这就是流通重要之体现。

但马克思紧接着指出“这并不是把流通当事人和生产当事人混淆起来的理由”。^⑥ 流通时间虽是必要劳动时间的增加,但它并不创造价值,其真正意义在于,“资本的流通实现价值,正像活劳动创造价值一样”。^⑦ 马克思还有一段经典阐释,批判了流通资本拜物教意识“流通魔术师们幻想,利用流通速度除了可以减少资本本身为资本再生产所设置的障碍以外,似乎还可以搞点什么别的名堂,这是走上了歧途”;“最荒谬的是”看到了“资本从自己额外的流通时间得到补偿”,就认为“资本还是一个独特的、同劳动分离的创造价值的源泉”。^⑧ 可见,马克思将流通的重要性放在了与生产不同的维度上。二者相互联系、互为条件。相对于生产对价值的创造,流通的关键差异在于对价值的实现。这才是流通重要之所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89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85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3—144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2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4页、546页。

(三) 资本流通形式下的关系与矛盾

马克思指出流通是交换的要素,但他又提出了流通这一概念作为重点,说明二者有实质区别。他指出如果只分析交换,“这样的视角还留有古典经济学的表面与片面考察的余毒”(大谷祯之介,2013)。通过对流通概念的抽象,马克思对交换的分析跳出了商品与商品之间的视角,也跳出了交换本领域的分析。从生产和流通的统一性角度,马克思揭示出最初的交换何以被卷入资本的增殖运动,流通如何演变为生产的要素,并连同生产统一被资本支配。而通过资本的流通造就不平等关系的根本上还在于“小流通”——资本家在等价交换外衣下购买劳动力商品,相比资本对活劳动创造的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无偿占有,资本家之间的看似自由和平等的交换,就成为“资产阶级社会表面上的东西”。^①可见,流通所涉及的复杂关系不能用一般的交换视角来揭示。如列宁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②

事实上,马克思说流通是从总体上看交换,并不是指流通包含交换的全部内容,而是说流通不是个别的交换,是交换过程连续进行的整体和全社会商品交换关系的集合。如他所说“商品世界的流通过程,……就表现为在无数不同地点不断结束又不断重新开始的这种运动的无限错综的一团锁链。”^③商品流通不只“发展了人类劳动的物质变换”,而且使“整整一系列不受当事人控制的天然的社会联系发展起来了”。^④商品交换是形式,其背后均涉及商品所有者的经济利益实现,隐藏着市场实现这一敏感的、最富挑战性的本质问题。流通过程“买难”“卖难”的交替意味着经济利益的实现是不容易的;流通过程还会从供求、价格、竞争等多方面影响产品分配和社会消费,由此关联着经济利益在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协调。

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下,卖和买的分裂虽包含了危机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现实,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⑤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支配了生产,流通成为生产的一个要素和过渡阶段,生产者以“生产力为尺度进行生产”,“不考虑市场的现有界限或有支付能力的需要的现有界限”;^⑥且由于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工人作为庞大消费群体的有效需求往往不足。这两方面作用必然导致商品积压。表面看,流通越发展似乎越能化解这种“卖难”,而实际恰好相反。

这是因为,一方面,流通不是过剩性危机的源头,真正的根源深藏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处,只要不改变生产资料私人占有性质,资本的本性就会使资本积累和贫困积累之间发生矛盾性。流通周转的加快和市场的扩大只能在合理限度内加快市场实现,对过剩性危机来说则无济于事。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受资本支配,增殖驱动下的流通资本反而对生产的无政府状态起推波助澜作用。马克思说“资本不能从流通中产生,又不能不从流通中产生。它必须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产生”,^⑦意思是流通不生产剩余价值,但脱离了流通又不能使价值增殖从而使货币或商品转化为资本。又说“资本在能够像蝴蝶那样飞舞以前,必须有一段蛹化时间”。^⑧说明流通本身生产着资本的生产条件。资本的生产无限追逐剩余价值并要通过流通来实现,流通难以避免助力资本的本性,扩展到世界市场上也是如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88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4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35—136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4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93页。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当今时代的资本全球扩张就生动展示了以上矛盾。像马克思指出的“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开发,到处建立联系。”^①“资本越发展,从而资本借以流通的市场,构成资本流通空间道路的市场越扩大,资本同时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去更多地消灭空间”。^②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的确表现得如此,“资本主义只是超出国家界限的广阔发展的商品流通的结果”。^③流通空间的扩张并没有消除过剩性经济危机的矛盾,而是将其带到了世界市场上。

(四) 流通领域的费用与劳动价值

在《资本论》第2卷《流通过程》一章,马克思划分了纯粹流通过程、保管费用和运输费用。其中较有共识的结论是:运输费用是生产费用在流通领域的追加,其劳动是生产性劳动。^④在后人的研究中遭到颇多误解的是纯粹流通过程,即舍象掉与商品使用价值有关的流通活动,单纯考察价值在货币和商品间相互形式转化的费用,具体包括用于买卖、记账、货币上的费用。马克思认为这部分劳动不创造价值,“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⑤后人常说随着第三产业发展和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上升,这一结论过时了。其实马克思的阐释非常清楚、严密,他把买卖行为的所费比作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其“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⑥说明这类不创造价值的劳动和生产劳动相比,各有各的必要性。马克思还特别强调“资本家手里的商品交易具有的规模”,或者产业资本家将这种劳动转移给“由他们付酬的第三者的专业”,都不会改变这种职能的性质本身,不可能发生“变体的奇迹”。^⑦这并非马克思囿于历史条件对劳动价值的认识局限,而是由商品生产的社会化性质决定的,是社会财富必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纯粹流通过程无节制的膨胀会加剧经济脱实向虚的虚假繁荣。

对商品储备费用和保管劳动的误解则缘于其复杂性质。保管和运输有一定相似性且在现代物流业中常常交叉融合,后人的研究将其合称生产性流通过程是有合理性的,但马克思将其分开阐释也是有一定原因的。保管过程是价值的保存不是价值的形式转化,显然与纯粹流通过程原理不同,但它也不同于商品的运输,商品在流通中的保管不形成使用价值而仅使“它的减少受到了限制”,新加入的劳动需要按比例分摊到商品价值中去,“因此使商品变贵”。^⑧其更大的复杂性还在于,商品储备必须有一定量而且大于平均销售量,才能满足一定时期内的需求量,其中既要考虑到买者范围的不断扩大,又要以商品再生产的时间为转移而更新储备,这一过程中却可能产生储备的“不正常形式”:当商品储备不再是流通的条件而是卖不出去的结果时,其产生的保管费用就成为价值损失。这部分不正常形式则难以辨识。一方面,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扩大会引起商品储备的规模扩大,“没有流通的停滞,就不会有储备,……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另一方面,当商人手中的商品的流通已经停滞时,生产者的资本的流通过程则可能仍然畅通,因而“会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特别是在现实的运动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变得神秘莫测时,更是这样”。^⑨

其实,生产和流通互相交错,流通领域的费用和劳动就有了混合特征,不同性质劳动交织附着在相同流通主体上,更加大了混合类劳动性质。例如,零售商业就融合了分割、称量、分类、测定、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8页。

③ 《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9页。

④ 限于篇幅从略,可参见王晓东和谢莉娟(2020)。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4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47—148页。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57、156页。

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63、166页。

装等生产性劳动,体现为“混合类的东西”。^①而在资本驱动下,争夺剩余价值的力量会使纯粹流通过费用超支,如市场寻租、囤积居奇、虚假广告、价格欺诈等,不仅阻碍价值实现,而且会增加不正常形式的储备和保管中的价值损失,降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

(五) 商业资本及其历史考察

商业资本是产业资本的特殊转化形式,具有不同于产业资本的专门特性。在《资本论》第3卷的第四篇,马克思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甚至它的优秀的代表,都把商业资本直接和产业资本混为一谈”。^②在他看来,将商业资本看作产业资本的一个分支部门或特殊投资领域,是“荒唐的看法”、“粗陋的见解”,二者有着“天壤之别”。^③

首先,马克思对商业活动规律的分析是置于一定社会形式和生产方式下的。如上提及,商业资本是资本最古老的存在方式。商业资本增加了生产者为了交换而进行生产的动力,其发展到一定水平“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前提”。^④而一旦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考察界限,商业资本的职能就发生了质的变化。马克思批评道,重商主义仅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而呈现的表面现象出发,只抓住了假象。事实是,在不发达的生产方式下,商业利润“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商业的规律”就表现为“贱买贵卖”,或者说,“不是等价交换”。^⑤因而,将现代商业的本质也理解为贱买贵卖就是错误的认识。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商业利润的规律发生了根本变化,生产价格对商业来说变成了“一个既定的外部的前提”,^⑥商业部门的周转只能影响单次周转的利润和价格。对单个商人特别是零售商而言,要遵循的一个根本原则是“薄利快销”,即加快周转以压低单次售价,“但不会使他的利润降到平均水平以下”。^⑦可见,资本的发展最早出现在流通过程,但不意味着商业使工业发生了革命,反倒是商业资本作为特殊资本执行特殊职能的周转效率,要以先进生产力发展为前提和基础。

其次,基于货币投资而持续经营商品是商业资本的职能核心。商业资本能节约流通投入、缩短流通时间,“独立的流通当事人”只是必要条件,更关键的是“商人预付货币资本”。^⑧商业资本的G—W就是产业资本的W—G,从而生产者提前收回货币。否则,生产者的流通资本中的货币准备金的比例就要增大,再生产就受限。进而,由于商品经营资本的专业化效率,全社会被束缚在流通领域的资本就得到节省,商品资本的形态变化更快,也间接增大了用于直接生产的资本;同时,商业资本周转越快,越能间接促进产业资本积累。商业资本的另一“亚种”是货币经营资本,其在分工原理上与商品经营资本类似,但本质上还有相区别之处:商品经营表现为G—W—G这种独特的流通形式,“在货币经营资本那里看不出这样的特殊形式”,货币经营“在G—G中作为中介的东西,在这里与形态变化的物质要素无关”,“只与商品流通的一个要素即货币流通的技术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的货币职能有关”。^⑨在分析商品经营资本时,马克思就指出其专业化效率以不超过必要比例为前提,而货币经营资本作为“纯粹技术性的运动”,原则上就更是如此。^⑩

可见,商业资本达到充分的发展,就能提升全社会流通资本的效率,畅通经济大循环和促进生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20页。

②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页。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0页。

④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4页。

⑤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7—369页。

⑥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3页。

⑦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49—350页。

⑧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03、305页。

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97、358—359页。

⑩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51、359页。

产效率;其超出社会需求则会加剧生产过剩和结构失衡。并且,如果商业领域的货币资本不断与商品脱钩,由 $G-W-G$ 过度蜕变为 $G-G'$,就会加剧虚拟资本的自我增殖和经济脱实向虚。但资本主义经济又总是要发生以上失衡。资本主义生产的较大商品量,会越来越多地进入商业,在现代信用制度下,商业资本“支配着社会总货币资本的一个很大的部分”,商人可以在物品售出前反复购买而不会受限,这种弹性创造出的虚假繁荣“驱使再生产过程越出它的各种限制”;随着存货变多,一旦商业资本在某个点上的回流突然变慢变少,经济危机就往往暴露和爆发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业中”。^①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流通特殊及实践

马克思重点考察了资本主义流通的特殊规定性,其中包含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通一般规律,至今仍有深刻启示。同时,中国流通实践也为归纳社会主义流通特殊和丰富马克思主义流通经济学说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样本。

(一) 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多种流通形式的共生发展

马克思已揭示了资本流通形式($G-W-G$)并非资本主义经济专属,而是商品经济的共有形式,只是在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方式下发展成了绝对主流的形式,形成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普遍的社会化大流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发达的商品流通,就谈不上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处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社会形态的发展中阶段(谢莉娟和王晓东,2020),仍然是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重要物质积累和创造条件的阶段。我们要积极运用资本流通的有益力量,通过愈益发达的社会化大流通充分激发市场活力。但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相联系的社会化大流通应自觉遏制“资本的本性”,并促成多种流通形式共生发展。

首先,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大流通除了资本流通形式外,还应保留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一致的、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或交换目的的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一定比例的高质量发展。马克思以公式 $W-G-W$ 表达简单商品流通,它虽指向生产者之间以货币为中介的直接交换形式,但不应被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的直接流通渠道。简单商品流通区别于资本流通形式($G-W-G$)的实质在于经济活动的动因不同,前者目的不是价值增殖而是占有使用价值并消费。而现代企业自产自销的零售活动,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情形下,实际上仍服务于 $G-W \cdots P \cdots W \leftarrow G$ 的资本生产过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所谓简单商品流通形式,主要表现就是以劳动者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商品流通活动,无论是自产自销还是先买后卖,都是劳动者解决生计以满足消费需求并改善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这种“卖是为了买”的简单商品流通基本不带有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比如开小店、摆小摊的传统个体经济,以及开网店、做直播的“新个体经济”等;再如既有研究提及的将农村贫困生产者和城市普通消费者直接联结起来的“巢状市场”(叶敬忠和贺聪志,2019),以及新时代乡村振兴背景下大量涌现的个体创业者的小店经济等。在社会主义市场中始终保持一定比例的此类简单商品流通形式,是激发经济活力和贯彻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②在互联网和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还要推动此类简单商品流通的高质量发展,特别是通过新技术赋能充分释放其促进劳动者就业创业和减贫增收的长效机制,而防范其被卷入资本无序发展的逻辑。

其次,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还要求在整个社会商品流通过程中,实现简单商品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39—340页。

^② 以《中国贸易外经统计年鉴》2018年数据为例,批发零售个体经营户在批发零售产业活动单位中比例为97.05%,在批发零售产业活动单位与法人企业单位总和中的占比为13.12%(其中零售领域该比例高达22.84%),因该数据未统计“限额以下”情况,个体商户的实际比例远超以上结果。

流通“目的”和资本流通“手段”的有机结合 赋予公有制经济资本流通形式新的内涵。我们充分发展资本流通这种形式 就是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流通中的价值增殖对于生产效率积累的合理性作用 与此同时 要能遏制流通资本的无序飞舞就要发挥政府作用 最重要的抓手就是公有制资本。^① 其实 资本主义单个企业生产的价值“形成”往往是有周密计划的 但资本之间进行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的流通过程往往是自发和无序的 而流通过程又是各种利益关系的总体现 流通领域的矛盾积累又进一步加剧了全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因而 公有制对私有制的替代不仅要着眼于破除生产领域的私人占有 更要重视社会化大流通的可调节、可控制。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基础上 社会主义生产和流通的根本目的是一致的 都是为了满足人民需要 公有制企业是保证贯彻这一理念最重要的微观基础。以最有代表性的国有经济为例 虽然政企之间通过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实现了分开 但由于国有经济是全民所有制生产关系的性质 国家可以利用国有经济的力量自觉规划和调节国民经济发展方向 限制甚至消除市场的自发性、盲目性(刘凤义 2020)。公有制经济主导下的资本流通形式表达式就应体现新内涵。如图 2 所示。生产资本虽然体现为 $G-W \cdots P \cdots W'-G$ 的过程 但我们获取利润是扩大再生产的手段而不是根本目的和归宿(鲁品越 2020) 或者说 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创造社会财富是手段 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才是目的(张宇 2016; 金碚 2018)。这一理念还要继续在流通领域贯彻 商业资本表现为 $G-W-G'$ 的价值增殖过程从根本上也是以满足广大劳动者对使用价值的真实需要为最终目的。同时 在经济红利的分享方面 国有企业的利润要在国家、企业、职工之间分配 并更多地体现劳动者收入的增长,^②也从分配制度上约束了资本无序增殖的动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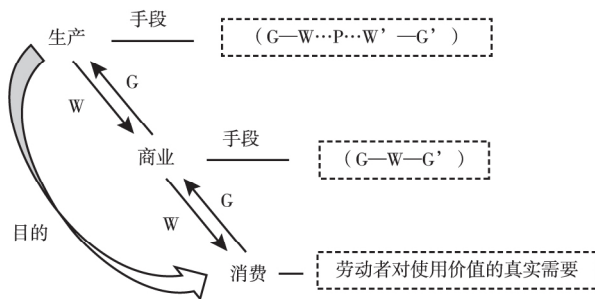


图 2 公有制为基础的资本流通形式示意

在中国流通领域改革开放过程中 随着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 虽然国有资本占比明显下降 但其主体作用则不能放松 对于牵涉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商品流通领域特别是在批发环节 国有资本始终以控股、参股等不同方式参与实际经营。^③ 再如新时期不断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 也是旨在商品流通领域不断提升公有制资本的竞争力和影响力。虽然公有制资本占比总体在下降 但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且相比私营企业增长突出。^④ 值得说明的是 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数量

① 根据党的十五大报告,“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里所指的公有制资本也是以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来界定的,即公有制经济的资本。

② 以 2003—2019 年上市企业数据为例(数据来源:国泰安数据库,https://www.gtarsc.com/):其一,国有流通企业高管同员工的平均薪酬之比的均值为 81.99,在私有企业中该比为 123.00,其中高管薪资计算参考杨瑞龙等(2017)。其二,利用企业净利润与应付职工薪酬之比来反映资本收益与劳动收益之比,国有流通企业的均值为 3.13,而私有企业为 5.85。

③ 结合国家统计局年度数据库和国泰安数据库,本文具体计算了 1999—2019 年间,以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中的国有企业资产占比来衡量的国有资本占比,以及 2019 年在批发零售上市企业中,国有控股和参股企业的数量占比,已供审稿人审阅,限于篇幅略去展示。

④ 以“劳动生产率(亿元/人) = 商品销售额(亿元) / 年末从业人数(人)”来衡量,在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中,2006 年,国有企业、公有制企业、私有制企业的人均商品销售分别为 0.0248、0.0220 和 0.0179,而到 2019 年分别为 0.1172、0.1105 和 0.0520。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分年度数据库,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

和作用提升,加强党对私营经济特别是新兴互联网乃至数字化平台经济的领导,强化社会主义先进意识形态对私有资本的引导,对于自觉防范流通资本的盲目性和自发性、特别是防范无序竞争和垄断具有愈加突出的意义。

(二)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现代流通体系建设成为流通体制不断深化市场化改革的突出成果之一。但流通体系的提法本身带有中国特色。其实,流通体系出现在改革初期的政府工作报告和政策文件中,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区别于计划分配式流通模式,比如“改变封闭的、少渠道、多环节的商品流通体系”,^①再如实行“开放式、多渠道、少环节的批发商业体系”等,^②重在突出破除传统流通体制而建立市场化的流通体系。后来固定成为一个普遍接受的说法。如今我们谈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并不存在一个从宏观上一目了然、可视可见的系统,而可以理解为流通经济过程各要素按照市场规律及内在联系组合而成的统一整体。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流通体系有不同划定,主要缘于对流通概念有不同理解,对流通做了宽口径的界定,流通体系要涵盖的内容就宽,反之则窄。前文对流通的概念已做说明,关于流通体系则另需撰文来探讨。在此不影响我们从整体上归纳它的特殊规律。

其实,所谓流通特殊或中国特色并不是“特”在“体系”这个提法上,而在于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特殊问题,更具体来说,就是在不断深化市场流通体制改革过程中牢牢抓住供给侧这一最根本的源头,使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始终与中国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本质要求相一致,表现为服务于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理念的几大关系的统筹。(1) 开放与可控的关系。中国市场流通体系构建中的一个核心着力点在于“搞活”流通,形成与世界市场接轨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全面开放流通体系;但中国特色则在于“开放”必须兼具“可控”的特征,防止流通体系与供给侧的生产目的脱节。其中主要是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重视优化流通宏观管理和顶层设计,如上文提到国有流通企业、供销合作社等公有制商业对稳定国内市场所发挥的主体作用,后文还将更具体谈及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和流通调控,这些都超越了资本主义国家运用财政、信贷等政策的一般性宏观调控,从自觉性和计划性的高度上防范了流通过程陷入资本逻辑。(2) 物流与商流的关系。结合上文概念界定和流通领域的费用与劳动构成,现代流通体系至少囊括物流体系和商流体系这两大最核心内容,二者之间的平衡是合理化配置流通领域社会劳动量的体现。其中,现代物流体系(包括其内含的交通运输体系)是流通体系承担生产性职能和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的重要着力点。而针对物流体系重资产特征明显、短期内投资回报低的问题,中国特色现代流通体系的独特性就在于,由国家对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进行集中组织和大规模兴建,为构建高效畅通的物流体系和夯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超前配置基础性物质条件。(3) 实体和虚拟的关系。中国特色的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要配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切实服务于消费者对使用价值的真实诉求,始终防范流通领域与实体经济脱钩。国家对过度金融化、数字化泡沫等虚拟经济信号保持高度预警,包括在数字化背景下加大对互联网平台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监督管制,都是中国特色流通体系的具体体现。(4) 城市和农村的关系。疏通城乡双向流通一直是我国流通体系建设的重点工作之一。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特别是贫困山区的互联网、物流等基础设施配备,通过城乡一体的现代流通体系激发以商业促产业、以创业促就业的减贫增收机制,彻底扭转城乡商品流通发展的“二元经济”现象,使流通体系在更高水平上服务于社会主义城乡共同富裕目标。

事实上,从纵向时序上看,我国市场流通体系也是与不同生产发展阶段相适应循序渐进构建起

^① 《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1981年)》,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00-12/06/content_5328237.htm。

^② 《国务院批转商业部关于当前城市商业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报告的通知》,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N7904&filename=GWYB198417003&v=JDjVQCC%25mmd2F5RZY4NcAFQ5BaJVI35t2hD%25mmd2BXu7hnWmQ2A8ikiEGmNRXZd0LgzsgcZDR。

来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物质匮乏的环境下,以“统购统销”“统购包销”为代表的分配型流通体系曾配合计划经济,为摆脱一些国家对新中国的经济封锁和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以及保证供应和稳定价格发挥了一定的历史使命。真正的“市场”流通体系构建始于改革开放。20世纪80年代初,流通体系主要是配合“三多一少”^①的改革目标尽快完成市场化转型;90年代初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流通所有制结构和经营主体更加多元,开始有控制地允许外资商业进入零售业;根据加入WTO承诺,中国流通领域在2004年全面对外开放,在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并存基础上,逐步奠定了提升“现代”流通体系的总基调。并且21世纪以来,互联网和电子商务大发展使流通领域开启了技术驱动的新变革,形成领先于世界的“互联网+”流通模式,线上与线下充分融合成为中国现代流通体系的突出特点。而与之同步,随着供需结构性矛盾和生产问题日益积累,2015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确定“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这条主线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及各政府部门密集出台40多个文件支持流通业发展,^②并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消费、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发展等问题联系起来。在国际经贸环境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加剧之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再次提到“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在审议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建议中提到“构建现代物流体系”“健全现代流通体系”。从中可见,我国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始终把握住了过剩性危机治理及防范的源头在供给侧这条基本规律,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保障基础上,始终把流通发展置于“消费的需要决定生产”的动态框架中(纪宝成,2018)。正在发生并加快进行的流通体系数字化转型趋势也不会使问题的本质发生变化。在2020年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中,在电子商务和先进物流体系支撑下,流通保供表现突出,但设想如果生产跟不上,任何渠道都会无货可供,这就是现代流通体系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之间的关系体现。

(三) 以政府和国有经济为主导的重要商品储备和流通调控

如上所述,商品储备对商品流通正常运行极其重要,流通发挥调节供需和吞吐稳定的蓄水池作用很大一部分体现在商品储备上。由市场机制自发决定企业自愿范围内的日常或周转性的商品储备量是市场配置资源的重要方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是提高储备效率和降低流通费用的最为经济合理的手段。但中国还形成了一条特殊经验:重要商品储备制度成为发挥政府作用提升流通调控力从而调节市场稳定性的创新举措。这一点马克思没有提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可供借鉴的经验也不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多级储备体系,政府储备还拓展到以国有经济为主体的经营性储备,对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和惠及民生起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条经过实践检验的流通特殊规律。

其实,仅仅从战略性的商品储备角度,还不能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独创之举,相比资本主义各国也存有的战略性物资储备,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至少有两点不同。

第一,政府作用突出,重要商品储备不只在突发事件时起应急保供作用,而且在居民生活必需品市场发挥常态化的吞吐稳定功能,广泛惠及民生。美国虽然也有粮食储备制度,但以民间储备为主,政府只对储备农场出台设施信贷,政府的价格干预性收购也已限制在了极小范围内(普莫喆等,2019),商品储备谈不上是流通调控手段。相比而言,中国重要商品储备制度不仅是为“托底”或“救火”,而是一种体现着自觉性和计划性的责任管理制度,中央和地方政府职责分工明确,保障

^① “三多一少”:多种经济成分、多种经营方式、多条流通渠道、减少流通环节。

^② 限于篇幅略去相关文件展示。

生活必需品的正常供应和价格稳定。如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保障主副食品供应,做好居民生活必需品保供调度,防止物价过快上涨。^① 其实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就有动用50亿斤专储粮投放市场缓解粮价暴涨的经验,后来在2003年由国务院颁布了《中央储备粮管理条例》,在2003年和2008年,中央储备粮的较大规模投放有效应对了大豆价格上涨和全球粮价暴涨。再如,中央储备肉在20世纪80年代起就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2007年又完善了各级政府储备体系管理办法。这一制度不仅在“非典”、洪灾、地震等重大事件时发挥了平抑市场、安定民心的作用,而且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通过中央收储和冻肉投放平抑了两次大的价格波动。应用这一思路,中国近年来也适当扩大商品储备的范围。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重点工作部门分工方案》指出要完善中央与地方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其中提到要适当扩大肉类、食糖、边销茶和地方储备中的小包装粮油、蔬菜等生活必需品储备规模。^② 这样就能更普遍地作用于居民日常生活。各级政府或承储单位向市场投放储备肉菜几乎每逢春节等重要节假日前后都会发生,在遇到突发天气异常价格波动时,地方政府也会动用储备商品来维持重要必需品价格平稳。如2019年国庆节前期,考虑到猪肉价格受多因素驱动持续上涨,中央储备冻猪肉连续三次向市场投放累积达3万吨,起到了保供稳价作用。^③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省市向市场投放储备菜、粮、肉等重要消费品成为保障人民生活安定的重要力量。

第二,以国有经济为主体、同时吸收民营力量,推动政府作用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不断提高商品储备效率。政府对重要商品的计划性储备实质上就是超出市场正常需求量的储备,假如由企业来承担,就成了储备的“非自愿”形式,通过补贴交给民间来承担则动力不足,且难以成为长期行之有效的流通调控手段。以政府为主导具有必然性,但也可通过“商代国储”的方式委托企业存储。国有企业就在这一平衡中起关键作用。2000年后,中国基本实现了储备管理公司、直属库、承储企业的多级管理模式,其中储备管理公司和直属库以国有经济为主,而承储企业则广泛吸纳社会力量。以2019年为例,北京市《关于印发北京市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名单的通知》,99家单位中有82家为国企,而商务部关于建立中央储备冻猪肉承储企业备选名录库中,50家企业中则只有7家国企,大部分吸收了民营企业。^④ 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一般还会根据情况增加经营性储备或承担临时储备任务。以笔者跟踪调研的国有零售企业北京超市发为例,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按北京市商务局要求采购了远超正常销售量的160万袋方便面作为储备,疫情后再大量促销抛售;米面粮油则按平时5倍囤货,每天有30吨大白菜投放到门店,供应量是平时的4倍多,一周内完成了300吨成品粮采购,存储量是平时的2—3倍,以发挥保供稳价作用。

可见,重要商品储备已成为保障中国商品市场平稳运行的制度创新。2018年4月,按照《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国新组建成立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体现了党中央对国家储备安全和监管的重视。这一制度还将继续支持流通调控与宏观管理机能的完善。

(四) 流通业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定位

与本文的流通经济范畴相一致,国民经济中的流通业则是由流通经济活动集合而成的对应行

^① 《习近平:要落实“米袋子”省长责任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食品保好供》,http://www.ccn.cn/jjx_yyjx/yyjx_gd/202004/t20200403_5109414.html。

^② 《国办:要完善中央与地方重要商品储备制度》,http://politics.people.com.cn/big5/n/2013/0605/c1001-21750013.html。

^③ 《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开展第三次中央储备冻猪肉投放工作》,http://bgt.mofcom.gov.cn/article/c/d/201909/20190902901358.shtml。

^④ 参见《北京市财政局 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关于印发北京市商品储备管理公司及其直属库名单的通知》,http://czj.beijing.gov.cn/zwxx/tzgt/201912/t20191206_893502.html 《中央储备冻猪肉备选承储企业公示》,http://www.mofcom.gov.cn/article/jiguanzx/201901/20190102831122.shtml。

业,这与一般意义上具有同类属性的经济活动集合形成具体产业的原理相同。进一步结合上文流通过程原理可知,商品流通领域包含着生产性流通过程和纯粹流通过程的科学划分,流通领域劳动性质是生产性和媒介性的统一。^①基于此,就流通业的行业类属而言,不应仅限于对应着商品交换活动的商品销售行业,还要将对应着生产性流通过程的物流行业囊括在内。在现行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中,以不同行业部门所从事的主要活动来确定,现代商品流通主要对应两大子产业,也即商品流通过程由抽象到具体,对应于国民经济细分行业的体现:一是着重体现媒介性劳动性质、兼顾从事一部分运输保管等生产性劳动的批发零售等商品销售业;一是以生产性劳动性质为主、作为马克思所指的“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的交通运输等现代物流业。^②我们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更好满足广大劳动者对美好生活需要的生产目的出发,形成了流通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性和先导性”定位,^③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依据,又融合了中国经验的理论上升。

而如何理解流通业的基础性,通俗意义上固然可有多种不同解读,例如说交换是再生产的基础,又或者商业是为全社会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基础,但如果仅仅从这些角度,还只能算作是发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共性规律,所谓的基础性仍还只是对现代流通业的重要性进行了提升。其实,我们将流通业定位于基础产业,其能够反映社会主义流通特殊性的最重要依据应在于:对流通领域生产性职能的强化与提升,主要体现为通过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来着力改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马克思已指出商品运输是发生在流通领域的特殊类型的生产活动。建立在完备基础设施基础上的现代物流业的不断发展和日益发达,是流通领域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对于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等流通中“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相关投资为单个资本带来的直接利益微小。因此,除非其“能由资本本身在资本的条件下创造出来”,或者,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尤为发达,否则均需“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④但所支付的多少则取决于国家财富的积累程度和政府的投入意愿,因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很难实现充分配置。在我国建设互联互通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过程中,高铁建设的成就已彰显出由国家集中组织投入大规模生产劳动和财力,充分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超前配置先进流通基础设施的能力。而这种利用国家手中规模巨大的公有资本主导超高水平的基础设施建设,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单纯从克服市场失灵角度提供一般公共产品的做法,是由国家作为生产资料公共所有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总代表按照社会需要配置社会资源(张宇,2016),其愿意接受规模较大、回报时间较长的投资项目(荣兆梓,2017),更多体现国家和人民所需(王艺明,2019),这一中国特色为资本主义国家望尘莫及(王晓东和谢莉娟,2020)。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民能居家购物保持生活安定,发达畅通的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及其支撑的物流配送体系,为电子商务支持流通保供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流通业的先导性定位则是对流通固有或特有的媒介性职能的发展和提升,主要体现在商品销售行业作为社会主义大市场中的买卖活动的集中,不仅要致力于供需有机衔接,更应有能力引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其更好地满足劳动者日益升级的消费需要。其作用机制不只在单向推动从生产到消费的价值实现的一般媒介性,而更要着力提升从消费到生产的市场预测预警作用,帮助供给方及时识别有效需求的动态变化,有效解决生产的不确定性、盲目性。这样就发挥了流通防范产能过剩和实现生产资源更合理配置的先导性作用。如果说这种先导性作用在以往信息化水平不高

^① 媒介性劳动不是《资本论》中的用语,本文采用了王晓东和谢莉娟(2020)对媒介性劳动的概括。

^② 马克思提出,“除了采掘工业、农业和加工工业以外,还存在着第四个物质生产领域”,“这就是运输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9页。

^③ 学术界提出流通业是“先导产业”的代表学者是刘国光(1999,2004),提出流通业是“基础产业”的代表学者是黄国雄(2005),目前对此基本形成了共识。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32页。

的条件下,其作用机制还受到某种限制的话,那么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流通业反向整合供应链的生产模式则具备了普遍推广条件(谢莉娟,2015;谢莉娟和庄逸群,2019),由流通业引领甚至支配日益定制化的生产模式,有助于形成消费经由流通决定生产的精准生产方式,这或许反映了未来新社会生产远景的一些征兆。毕竟让资本主义生产根据订货进行生产“同资本的本性相矛盾”,“即供给适应事先提出的需求,作为一般的或占统治的情况,并不适合大工业,决不是从资本的本性中产生出来的条件”^①难以自觉演变为资本生产的主流方式。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通过流通活动精准发现新消费需要和使用价值诉求,是体现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

总之,流通经济活动构建了连接供需匹配的现实的市场,随着生产发展和消费的个性化、定制化升级,流通领域也承接更丰富的生产性活动。流通业的基础性功能不再局限于物流领域,还会日益吸纳和增加真正的生产劳动,如上游供应链迁移到下游渠道的补充性生产活动。特别是在零售商业中,越来越多的纯粹的服务型业态叠加到零售场所中,或融入商品经营业务中,直接增大了流通产业所能承载的价值创造空间,^②并间接提升了流通业的价值实现能力,进一步强化了流通业对于推动供需精准匹配、引领产能合理配置的先导性职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未来发展,就要更加突出流通业的基础性与先导性功能定位。

(五) 支持和服务于实体经济发展的商业资本结构合理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我们要促进商业的活跃和繁荣,以充分激发国内大市场的活力和潜力,但商业资本发展及其结构优化以服务于实体经济为原则。结合我国商业实践,在这里先要说明,如马克思阐释的那样,商业资本职能必须体现:第一,拥有资金;第二,经营商品。我们不能以现实经济中的商业活跃度或业态数量来衡量商业资本的发展程度。在中国零售商业转型过程中就留下了这样一个值得反思的现象或者是教训。通过出租场地、柜台等方式向品牌商收取租金,并根据实际销售额分成,零售商没有预付资金甚至占压了供货商资金,也没有购入和经营商品,更像是物业房东甚至二房东。这种情况实际上没有发挥商业资本职能,就不能以开店多少来衡量商业资本的比例。当出现经营不振时,表面看似乎是商业供给过剩,而实际是商业资本的积累和职能发挥不够。

因此,这里要强调的是实质上的商品经营资本的发展,在国内市场还远未达到充分或充足的程度,下一阶段仍要推动商品经营职能的复归。但这其中要把握住商业和产业之间的发展关系。一般的规律仍在于马克思揭示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的各阶段中,商业支配着产业;在现代社会里,情况正好相反”。^③在充分竞争性行业,社会主义商业的利润同样具有从属于产业利润的一般特征,“薄利快销”仍是大多数商人特别是零售商要遵循的一个普遍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阶段,我们就更要特别防范商业暴利思维,杜绝在商业环节利用信息不对称,制造漫天加价甚至是天价服务现象。那些以为只在商业环节大做文章,仅仅靠制造“明星”或“网红”效应,甚至采取“网络刷单”“流量造假”“大数据杀熟”的做法,就能创造价值并大幅提高商业卖价、不断开拓市场赚大钱的想法,都是没有认识到商业资本的职能特性和利润规律。依靠过度的营销包装或者违背价值规律的所谓创新,必然是昙花一现,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而且对经济红利的分享和分配造成扭曲。

从现实的经验来看,发挥和完善公有制经济主体作用、增强国有商业竞争力和市场效率仍然是根本性大方向,对于克服私人资本在商业领域的盲目性尤为关键。在计划经济时期,公有制经济落实在商业领域主要就是国有商业统治了商品流通过程,“一二三零”固定渠道就是国有商业在当时贯彻国家计划的体现。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特别是在新时代发展中,公有制经济主体作用有了质的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533页。

② 对社会主义服务劳动生产性质的分析从略。参见王晓东和谢莉娟(2020)、王晓东和黎莎(2020)。

③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68页。

跃，“比重说”（国有商业在所有制结构中的占比）已不再适用，国有资本重点保有并布局在涉及国计民生、产业安全和保障人民基本生活的关键领域，其作用在于抓好关键的少数，保持一定的市场控制力和配合执行国家战略。特别是在国有资本比重并不算高的零售商业中，国有企业的流通机制与民营企业并无显著区别，国有资本通过充分融入流通领域的市场竞争，使渠道体系和销售网络能覆盖一定规模的市场，从而隐性承担品质担保、价格稳定以及特定时期应急保供等关键性作用。

在未来继续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大方向下，势必仍要发挥多种商业所有制共同繁荣市场的作用。这其中除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外，还要注意到，企业家对商业活动的引领性作用尤为关键。马克思多次指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是价值增殖运动的“有意识的承担者”。^①社会主义商业活动同样处处体现着资本的人格化，应将这种人格化上升为契合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的商业资本人格化。这实际上就是上升为代表社会主义商业文明的人格化的商业资本。毕竟，商业活动为谁服务，商业红利如何分享，企业家才是实际的掌舵人，其价值取向关系着商业资本能否自觉为人们的本真需要而服务，是自觉防范虚拟资本自我增殖无序发展的重要微观机制。

当然，当代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利润率充分平均化趋势已发生了较大变化，西方跨国公司利用对技术和流通的集中控制，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分包给新兴市场经济体，通过价值链进行利润再分配，进一步实现了对非垄断资本的转移性掠夺。西方四大粮商以跨国贸易为起点，逐步凭借资本优势和商业垄断，试图控制全球粮食体系和定价权，就是一个例证。认清这种局势，我们既要加快壮大先进制造业和培育强大商业民族品牌，更要在发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的国内市场上防范商业资本的垄断。在产业化发展尚不发达地区，固然要广泛吸引商业资本的力量以活跃和带动市场，但必须做好制度设计和风险防范，控制好商业资本这把双刃剑的刀刃朝向，以避免发达商业资本支配当地不发达产业时，带来价格扭曲和分配不公。当前平台经济、数字经济等模式的出现实际上加大了商业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支配能力。国家及时对互联网金融资本进行严格监管，以及防止大型电商平台通过垄断数据来垄断利润的“平台资本主义”泛滥，都是为了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并引发分配扭曲问题，更体现出从商业资本特别是货币经营资本领域发力，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和产业空心化的关键。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中国新时代流通经济研究亟需回归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的现实情况出发，本文对马克思流通经济理论的要点进行了系统再梳理，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分析了中国流通经济运行的特殊规定性。具体而言，首先，流通经济作为一个专门研究范畴主要对应“真正流通过程”（资本在生产以外的运动），这样，流通本质上就是通过交换过程对商品价值及其背后所有者的经济利益的实现过程。虽然在资本的生产之外仍会存在少量以获得使用价值为目的的简单商品流通，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趋势是将一切生产和交换都卷入社会总资本的流通，使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资本流通成为绝对主流形式。中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基本属性决定了，以社会使用价值为生产或交换目的的简单商品流通应保持一定比例的高质量发展，同时，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化大流通的资本流通形式是简单商品流通“目的”和资本流通“手段”的有机结合，在此基础上实现多种所有制性质的资本流通形式的共生发展。其次，在生产起决定性作用基础上，生产和流通的关系不能被理解为决定与被决定（或反作用）的简单线性关系，相对于生产对价值的创造，流通的职能特性在于对价值的实现，二者在每一瞬间都相互制约、互为条件，流通效率和生产效率同等重要。但只要不改变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性质，流通过程必然体现和加剧资本的本性。社会主义流通过程从根本上是要与中国基本经济制度有机融合，从供给侧的源头上防范过剩性生产，构建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相一致的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178页。

既开放又可控的现代流通体系。再次,流通领域是生产性劳动和媒介性劳动的统一,后者还特别体现在商业资本的专业化发展及其周转效率上。而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盲目性和自发性往往导致纯粹流通过程费用超出限度,特别表现为不执行职能的商业资本的游离和过剩,进而增加不正常形式的商品储备,诱发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将流通业上升为配合以人民为中心发展理念的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并实现支持和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商业资本结构合理化。更重要的是,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已充分彰显了市场和政府有机结合的重要价值。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如下。第一,在持续深化流通体制改革进程中,仍要大力推动国有流通企业、供销合作社等公有制经济的流通改革,加大公有制商业的竞争效率以巩固其主体作用;同时,继续推进流通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激发竞争活力并放大公有资本对多种所有制资本的辐射力。第二,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提升国内经济大循环背景下,统筹推进现代流通体系建设及其数字化转型升级。其中,流通体系建设应具整体思维,要更重视流通经济过程的宏观管理,加强流通领域的顶层设计和制度引领,不断完善市场机制并更好体现政府作用,以协调市场的活跃度和稳定性之间的关系。而流通体系要与生产体系更好融合,并更好服务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必然要联手大数据,以数字化为纽带形成“消费洞察—供需匹配—再生产资源配置”的联动机制。第三,继续完善重要商品储备制度,在优化中央和地方政府多级管理职能的基础上,适当拓宽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重要消费品的储备范围和种类,在以国有经济为主体提高储备管理效率的同时,吸收有能力、有社会责任的民营企业承担储备任务,全面提高市场化承储效率;同时,在任务性储备之外,强化国有企业对经营性储备的管理能力和对临时性储备的应急能力。第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继续大规模超前配置交通运输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加强农村地区和贫困山区的互联网、快递、电商等基础设施布局 and 网点建设,以及结合数字技术加强新型智能基础设施建设,使现代化物流体系在中国特色流通体系中构建更突出的前景优势。第五,引导和支持批发零售商业对商品自主经营业务的复归,对联营制零售模式下过度收取通道费、进场费等现象加大规范力度;同时,加强对商业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的反垄断治理,防范互联网平台等新兴资本形式的过度无序发展,在建立健全法规法律体系和加强社会主义商业文明建设基础上,引导大型电商和数字平台吸纳和支持个体劳动者创业创新,探索构建流通扶贫机制。

参考文献

大谷祐之介 2013 《从新MEGA第II部门第11卷来看马克思对再生产理论的推进——以〈资本论〉第2部的艰辛创作历程为视角》,《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期。

陈甬军 1985 《社会主义流通是有计划的自由流通》,《经济研究》第9期。

丁俊发 1998 《商品流通热点探索》,中国物资出版社。

丁俊发 2006 《中国流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高涤陈 1981 《流通过程与生产力经济学》,《财贸经济》第5期。

高涤陈 1984a 《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财贸经济》第4期。

高涤陈 1984b 《论流通经济过程》,《经济研究》第4期。

高涤陈 1985 《孙冶方社会主义流通理论中需要讨论的问题》,《经济问题》第1期。

高涤陈 1995 《流通经济论(续集)——高涤陈文集》,中国商业出版社。

顾准 1957 《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经济研究》第3期。

何炼成 2003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的流通经济论》,《中国流通经济》第8期。

黄国雄 1988 《试论现阶段商品流通的特点和商业的特殊作用》,《财贸经济》第2期。

黄国雄 2005 《论流通产业是基础产业》,《财贸经济》第4期。

黄任清 1983 《城乡商品流通渠道理论讨论会观点综述》,《经济学动态》第9期。

纪宝成 1991 《商品流通渠道分析》,《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纪宝成 2018 《消费的需要决定生产》,《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4期。

纪宝成、谢莉娟 2018 《新时代商品流通渠道再考察》,《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7期。

- 纪宝成、谢莉娟、王晓东 2017 《马克思商品流通理论若干基本问题的再认识》,《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6期。
- 金碚 2018 《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新思维》,《中国社会科学》第9期。
- 荆林波、袁平红 2018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流通领域发展回顾与展望》,《求索》第6期。
- 李茂生 1986 《建立社会主义流通经济学——记全国流通理论讨论会》,《经济学动态》第1期。
- 林文益、纪宝成、李金轩 1989 《我国市场、商品流通和商业体制中期改革的思路》,《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1期。
- 刘国光 1984 《学习孙冶方的流通理论》,《财贸经济》第2期。
- 刘国光 1999 《加快流通业从末端行业向先导性行业转化》,《中国商贸》第2期。
- 刘国光 2004 《加快流通产业向先导产业的转化》,《价格理论与实践》第6期。
- 刘凤义 2020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
- 柳思维 2017 《〈资本论〉中流通过费用理论的内容及其现实意义》,《经济问题》第12期。
- 刘向东 2002 《流通过费用理论的创新与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第11期。
- 鲁品越 2016 《流通过费用、交易成本与经济空间的创造——〈资本论〉微观流通理论的当代建构》,《财经研究》第1期。
- 鲁品越 2020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思想和实践上的新贡献》,《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
- 骆耕漠 1957 《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和价值问题》科学出版社。
- 普冀喆、吕新业、钟钰 2019 《主要国家(地区)粮食收储政策演进脉络及启示》,《中国农村经济》第11期。
- 秦毅 1984 《生产资料流通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观点介绍》,《经济学动态》第7期。
- 任保平 2011 《马克思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商贸流通理论比较》,《经济纵横》第2期。
- 荣兆梓 2017 《生产力、公有资本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评资本与公有制不相容论》,《经济研究》第4期。
- 宋则 1985 《流通过程超复杂化趋势初探》,《财贸经济》第2期。
- 宋则 2018 《零售企业放弃自营、普遍联营的经济学分析——重温卡尔·马克思商业资本学说》,《财贸经济》第6期。
- 孙冶方 1956 《把计划和统计放在价值规律的基础上》,《经济研究》第6期。
- 孙冶方 1959 《要用历史观点来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商品生产》,《经济研究》第5期。
- 孙冶方 1981 《流通概论》,《财贸经济》第1期。
- 王福成 2019 《〈资本论〉与社会主义商品流通》,中国金融出版社。
- 王晓东、黎莎 2020 《马克思的服务劳动理论及其当代启示》,《财贸经济》第3期。
- 王晓东、谢莉娟 2020 《社会再生产中的流通职能与劳动价值论》,《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
- 王艺明 2019 《从华为经验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新实现形式》,《财经智库》第4期。
- 吴小丁、张舒 2011 《商品流通研究的市场营销学理论渊源探析》,《外国经济与管理》第3期。
- 夏春玉 1997 《马克思的流通理论及其评价》,《当代经济科学》第3期。
- 夏春玉、丁涛 2011 《流通理论在经济学中的回归:一个学说史的考察》,《商业经济与管理》第8期。
- 夏春玉、丁涛 2013 《非主流经济学的兴起与流通经济学的复兴》,《北京工商大学(社会科学版)》第1期。
- 谢莉娟 2015 《互联网时代的流通组织重构——供应链逆向整合视角》,《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
- 谢莉娟、王晓东 2020 《数字化零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主义研究》第2期。
- 谢莉娟、庄逸群 2019 《互联网和数字化情境中的零售新机制——马克思流通理论启示与案例分析》,《财贸经济》第3期。
- 邢俊芳 1980 《把商品流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全国商品流通经济理论讨论会学术观点概述》,《经济研究》第5期。
- 徐从才 2006 《流通理论研究的比较综合与创新》,《财贸经济》第4期。
- 晏维龙 2009 《马克思主义流通理论当代视界与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杨承训 1986 《略论流通理论中的五个关系》,《财贸经济》第2期。
- 杨瑞龙、刘诚、党力 2017 《职工监事、经济民主与企业内收入分配——央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中国人民大学学报》第4期。
- 杨圣明 2014 《对马克思流通理论的再学习、再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第7期。
- 叶敬忠、贺聪志 2019 《基于小农户生产的扶贫实践与理论探索——以“巢状市场小农扶贫试验”为例》,《中国社会科学》第2期。
- 于光远 1959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问题的讨论》,《经济研究》第7期。
- 张宇 2016 《论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经济研究》第6期。
- 张卓元 1984 《社会主义流通是独立的经济过程——孙冶方关于社会主义流通概念研究》,《财贸经济》第6期。
- 郑宁 1983 《孙冶方的流通理论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经济研究》第11期。
- 赵效民 1986 《论流通范畴》,《财贸经济》第2期。
- 周丽群 2017 《马克思流通理论对流通改革发展的启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第3期。
- 祝合良、李晓慧 2016 《对流通理论与流通经济学科发展的几点思考》,《商业经济与管理》第12期。

Marxian Theory of Circulation Economy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Its Sinicization in China

XIE Lijuan^a and WANG Xiaodong^{a, b}

(a: School of Busines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 Research Center for Circulation Economics ,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ummary: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 especially the theory of circulation economy , is both an old and a new China issue.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in socialist economy , especially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 has triggered an influential debate in the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enefited largely from the break of the thought of no circul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market economy , the reform of circulation system has always been a vital part of building and improving the market system. In the current increasingly uncertain economic and trade situation worldwide , the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circulation in developing a robust domestic market and ensuring unimpeded flows in the economy stands out more. In September 2020 ,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resided over the eighth meeting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stressing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must be taken as a great strategic task in building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t present , lots of questions on circulation in China remain to be answered and related theories demand further development. This paper mainly deals with two issues. First , after a systematical summarization of the key points of Marxian theory of circulation economy in economic manuscripts of *Das Capital* , it makes clear again that the theory of circulation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rives from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Second , this paper concludes the circulation particularity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y considering the circulation generality in market economy and comparing the features of capitalism and socialism and expands Marxian theory of circulation economy with Chinese experience.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definitions of circulation in different levels in *Das Capital* and shows that circulation economy mainly refers to the circulation process or the movement of capital outside production. Essentially , circulation realizes the values of commodities and economic interests of their owners through exchange.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embodies the nature of capital but does not change the capitalist private ownership of means of production , thus aggravating the over-production crisis and rich-poor gap. The blindness and spontaneity of capitalist circulation process tends to cause excessive genuine costs of circulation , especially the dissociation and excess of commercial capital. Thus , the abnormal forms of the supply rise and the anarchy of production occurs. However ,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China's social and economic system dictate the circulation particularity in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First , various circulation forms coexist. Besides 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 , a certain proportion of simple circulation aiming at social use-value is needed. Second , it avoids overcapacity from the supply side and constructs an open and controllable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fitting the socialist production's purpose. Third , the government and the state-owned sector take the lead in improving the reserve system for important goods and circulation control. Fourth , it makes the circulation sector a basic and leading sector with the vision of people-centered development. Fifth , it improves the structure of commercial capital to support the real economy.

The following proposals are suggested. First , it is necessary to raise the commercial competition efficiency under public ownership and promote the reforms introducing mixed ownership in circulation. Second ,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irculation system , value the macro management , strengthen the top-level design and system guidance , and accelerate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irculation system. Third ,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reserve system for important goods and expand important consumer goods for daily use. The state-owned sector should be taken as the mainstay with the participation of private firms to raise efficiency. Fourth , the government should better play its role , and advance the construction of large-scale traffic transportation and telecommunication and new intelligent infrastructure , especially in the rural and poor mountainous areas. Fifth , it is necessary to guide and support wholesale and retail sector back to commodity operation , strengthen the anti-monopoly governance of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apital , limit the disorderly expansion of emerging capitals such as platform economy , and explore the anti-poverty mechanism through circulation.

Keyword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the Theory of Circulation Economy; the Circulation Particularity;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JEL Classification: F71

(责任编辑:荆 岩)(校对:曹 帅)